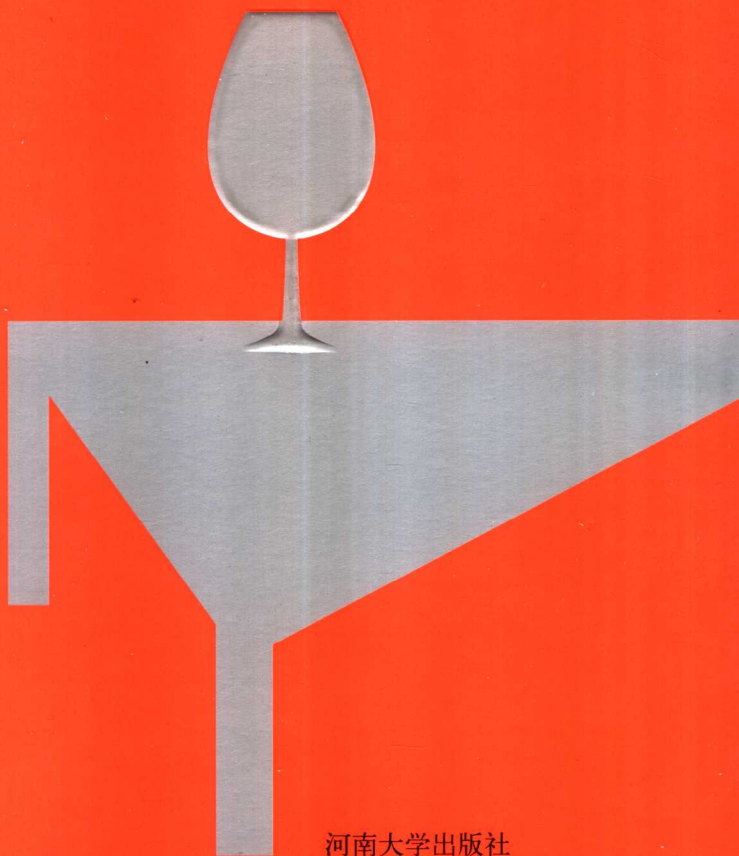


新思潮文档

总主编 金惠敏

媒介哲学

主编 王岳川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新思潮文档

总主编 金惠敏

媒介哲学

主编 王岳川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哲学/王岳川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4

(新思潮文档/金惠敏主编)

ISBN 7-81091-205-4

I. 媒… II. 王… III. 传播媒介-哲学-文集
IV. G206.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404 号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靳路遥
责任校对 张文礼
责任印制 苗 卉
装帧设计 张 胜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E-mail: bangong@hupress. 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22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ISBN7-81091-205-4/I·205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金 惠 敏

总 序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们曾经自信地划出了一个相对于“文革”的“新时期”，那确乎是群情激扬、光辉灿烂的峥嵘岁月。不过今天从思想史或者思想创新的角度看，“新时期”之“新”似乎仅具有拨乱“返”正的意义，是严格字面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它远承“五四”精神，近接 50 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关注的主题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主体性、异化、马克思手稿、美的本质、现实主义等等，均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时而低抑、时而高亢的老话题，而且，“左”、“右”对垒，阵线分明。“右”者坚信只要冲破“左”的禁锢，前景就是一片光明；而“左”者则认定，“右”将毫无疑问地导致动乱、无序和资本主义复辟。那时的“思想解放”其实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解放，要么就仍然禁锢着。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思想对抗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就是单纯而幼稚、激情而盲目，远称不上理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

进入 90 年代，思想界急剧分化，乱云飞渡，思潮翻涌。当我们感觉“新时期”这个概念已经无法表述我们当前的思想状况时，思想的“新时期”才真正到来。思维创新的佳境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它总是晦暗不明，难分难解，相互渗透，多种可能性并存。具体说，90 年代的思想界不再是明朗的“左”与“右”，它呈现出思想作为一

种精神活动的原生态,即使那些看起来不共戴天的学说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也不再能够划出个左右来,更兼以无从捉对厮杀的新儒家、全球化、知识分子、文化研究、身体注视、传媒哲学等等,一个问题甚至可能以其他所有的问题为其语境。

但是如果将思想还原为现实,那么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化运动以及当前的全球化与古老中国相遇的产物。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其思想界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让传统发扬光大,如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就是让传统自己说话,而在中国则除了这层任务之外,更加之以如何与西方这个“他者”相对话。“传统”与“他者”可能就是当今最大的哲学问题。

将这些9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本归档整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成熟或者完成使命。应该承认,这些思想还嫌稚嫩,更谈不上形成什么定论。但是,它们是我们走过或达到的一个个里程碑,是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实录,更蕴涵着无限的发展契机。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前进的话,那么这些文本之作为历史资料的参照意义甚或作为思想地图的指示作用将都是不言而喻的。

知我者,罪我者,我们一概表示感谢。

惶惶然,谨此为序。

2003年8月29日

北京花园村

王岳川

导 言

全球化问题多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学术界的神经,知识分子在为自己定位的同时,总是在思考问题背后的问题,并进而警惕问题的偏向性:一是以西方中心话语为方向,将中国现代化看成全盘西化,成为分享第一世界学术强势的权力知识分子;二是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为理由膨胀为一种极端的后殖民敏感性,受个体经验和本土经验限制而过分强调对西方的抗拒,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变形的自我巨型想像中,成为一种新冷战思维的播撒者。这两种方式,看似不同其实有内在的相通性,即都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身份重建丧失了信心,本质化了的本土文化独特性,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文化的消费者而非创造者。

在新世纪,东西方正在由文化对抗进入文化对话,由二元话语对立进入多元话语互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中国在信息传播等科技领域应该进入现代化,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应该站在更高的世界主义和人类性角度,以东方智慧在文化领域发展新世纪世界文化良知。现代化应该以“人为目的”。而且各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当代中国应该呼吁“发现东方”的理念而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① 因为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和互动。换言之,人类在经历前现代的手写文明、现代的印刷文明之后,进入到后现代媒体文明中,应进一步对这一文明进程和传媒文明的正负面效应进行哲学文化学的批判和反思,才能使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传媒哲学思想和批判精神得以凸现。

^① 参见王岳川《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

一 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 世纪思想史上一流的思想家,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是对大众媒体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必要的洞悉。

就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等关系而言,可以说从西美尔、梅洛-庞蒂以来,有很多思想家对其加以关注。尤其是当代思想家布迪厄对“身体”视域的深度分析,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世界人生的新路径。如他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论述,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是一种“刚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更值得深加关注。

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可以说是 20 世纪的一个基本学术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是不行的,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康德、费希特等),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德勒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一、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生命”变成了一个本体论的重要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柯和拉康哲学,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这些文化元素对他而言并非没有意义,但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它们,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地对抗它

们,因为它是人类文化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现代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传统式的内在和谐,而进入一种“自我”本质的重新定位。人具有自己的“处身性”,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

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完整的整体美的关键。因为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面部结构不可能脱离精神,因为它就是精神的直观表现。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容是精神的体现,也是个性的象征,它与躯体有着明显的区别。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的表现域,也是艺术最具有审美特性的地方。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却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尽管它也可以通过动作和造型来表达情感,如手的造型等,但仍然是不足以与面部相比拟的。因为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本质差异。

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的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也许,这一切早被西美尔在世纪之初就言中了。“身体距离”在现代人中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① 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的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的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

① 西美尔《门与桥》,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第 231 页。

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做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力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力,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实际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和谐音。

二、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

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张扬“身体”的重要性。他认为,思想就是常识、作用与变形,但惟一的条件是进行一种实验性的控制,而各类飘忽不定的意志和愿望就从这里生发。这意味着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我的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它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所以,身体在看之时能自视,在触摸之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身,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身体的悖论”。因此,当艺术家创作时,他是在实践一种独特的“知觉理论”,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他身体里面走进来,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那些事物上面去游荡,因为他要在那上面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我们通过这种变形,可以直观物质本身的无声意蕴和那梦幻般深沉的宇宙精神。

物体是思想空间的蔓延,是思想向事情本身的伸展。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思想所支配的身体,对思想而言并非对象中的一个,思想并不从中提取空间的全部剩余作为附带的前提。进一步说,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自然法则中。肉体对于灵魂而言,是灵魂诞生的空间和所有其他现有空间的存在方式。现象学“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艺术的深度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新的灵感和新艺术思想的生长点。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超概念的普遍存在的表现,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话语谱系。

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象的意义“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因为“我以我的整个存在一种总体方法去知觉,我把握事物的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①。于是,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

三、欲望生产与个体肉体

当代哲学家德勒兹和居塔里以“欲望生产”的理论,为当代人描绘出一幅新的生存图景:欲望和任何生产一样,创造现实、人的存在的世界。人成为欲望的主体,获得了不仅在对外部环境关系上,而且在对自己固有本性关系上的生存方式。“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都是由力比多决定的。“欲望生产”既把人的欲望,也把物质生产实践非理性化。“欲望生产”在现代甚至后现代社会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器官的躯体”及其衔接部分的主体。欲望首先是生存的欲望、行动和创造的欲望,然而欲望同时也是死亡、停止的欲望,这就导致了无器官的躯体的产生,不仅人的躯体有着一种欲望,同样社会生产中也有一种无器官的躯体,它不断地产生专制制度、资本剥削、拜金主义这些“躯体”。人的“欲望生产”在个体、自然和社会方面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此,人是一种无意识的欲望主体,在实现自身的可能性时,无意识地“消耗”着历史,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社会参数。

四、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现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工作平台。

“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塑型,恰好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

^①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50.

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① 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人们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谦恭或倨傲等不同的姿态。这正好成了当今“文化研究”的关注点。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

应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中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他者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的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勾画出来。

二 全球化知识话语与本土身份立场

面对全球化问题,世界重量级的思想家都对这一问题提出了

^① Pierre Bourdieu,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1990.

自己的看法,值得关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相当关注全球化问题,他认为,整个世界为达到全球化目的,要承受社会的不公正性以及社会的破裂,同时还要承受道德标准的败落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他坚持清理全球化负面效应——“全球化代价”:“缓慢走过‘泪水之谷’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它需要多少牺牲品?为达此目的会有多少边缘化的命运停留在这条道路的路边并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创造的文明成就会因此而陷于创造性的摧毁?”^①同样,美国解构哲学家J. 希利斯·米勒也认为:“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到完成还非常遥远。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全球化,今天人们都感到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双曲线阶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确证他是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②著名思想家哈维尔在哈佛大学的讲演则强调:现在的问题是“拯救人类”,也就是要把现代文明当成多元文化和多极文明来理解。要把注意力转移到人类文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要从这些根源吸取力量勇敢地创造世界新秩序。在各民族和各种文明、文化及宗教之间共存的问题上,需要呼唤超民族或宗教社群的出现。^③在社会学家阿明看来,必须抛弃自由主义乌托邦,改变越来越不平等的趋势,民族国家应该负起发展的责任来。在遭遇全球化的挑战中知识分子应该重新进行意识形态和社会思考,逐步解除全球化危机。^④美国思想家福山对全球化持一种乐观态度,他不同意全球化将导致普适文化的发展的说法。认为经济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一系列文化属性,包括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关于全球的讨论中有些人过高地估计了全球化导致同质化的效应,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实际的自由贸易制度和经济互相依赖,事实上将使人们以从前不可想像的

① 哈贝马斯《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访华讲演录之四)。

② 米勒《全球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③ 哈维尔《全球化的祸福》(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④ Samir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Zed Books, 1997.

方式凸显其文化差异。^①

西方学者的看法可以促使我们对全球化问题加以思考,并在全球化思潮中看到,在“知识型”转型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出现了观念上的分歧,已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差异性”成为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公共性与私人性、形而上与形而中的关键词。在我看来,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只能在多元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框架中,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使自身文化保持持续敞开性和长久交汇性。这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有可能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我认为,在全球化的问题上,应该明确以下基本价值立场。

一、超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峙

全球化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复杂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近些年这种不断增长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技术的全球化、经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新信息技术全球化等新特征。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的、跨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并走向后政治组合形式。事实上,“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时期两种相辅相成、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的冲突和融合。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从来都是彼此依存,而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是在冲突中融合而成,同时又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新更高的融合。所以,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说,“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融合”具有普遍性,单独抽出任何一维作为未来世界图景来阐释其发展轨迹,认为未来世界是“文明的冲突”或是“天下大同”,无疑都是有其盲点的。

我主张“文化对话论”。既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未来看

^①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与福山博士的谈话》,《秋风》2001年第2期。另可参考福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并借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个良性的参照系。

二、确立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问题意识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而在近代中国遭遇到“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从而彻底改写了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并连带地重新编码了中国文化的心态,即从世界领先的位置降到后发展国家的位置,使得文化心态上总是在古今中西之间摇摆,或者崇洋,或者自卑,或者赶超,或者闭关。使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转型中成为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一个国格尊严或民族存亡的问题。当然,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有更开放的心态和新的看法:对中学西学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学不分古今中西;对西方的器物类、制度类的先进体系能够“拿来主义”式地接受,而对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也能够展开多元文化对话。

由于全球化对中国而言既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意味着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甚至是一些难以割舍的东西。同时,又不得不接受一些东西,甚至是一些很难认同的东西。因此,对中国而言,全球化问题不是变得简单了,而是更加复杂了。因为不少人将全球现代化看成是一个世俗化进程,进而将世俗化仅仅看成是一种个体生命欲望的张扬。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用“汉语写作”所面对的汉语读者群“在国内”这一特殊语境中,其问题就更为复杂和难以把握。在我看来,如何从更大的跨国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展示个我的真正存在意义和生命归宿,如何从“自我身体”和“他者身体”入手进行深度描述,即不仅从“自我”的中国人视域去看世界,而且也从“他者”的眼光来看“中国”问题,才可以真切地查明自我的文化身份,并对当今世界东西方问题的认识有新的推进。尽管在全球化中不少人是双语写作,但母语的优先形式自不待言,这或许会导致某种身份错杂和问题的双重开启或双重遮蔽。在对私人空间或身体欲望重视的同时,同样有个“度”的问题,丧失了 this “度”,就会从有效的意义逆转成为丧失了合法性的无意义行为。

三、坚持全球化语境中的话语身份立场

西方文化话语往往通过扭曲第三世界人性的方式而获得自身

的话语中心地位,也就是说,个体必得放弃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身份而换取他民族文化身份,这种由被动到主动的姿态使当代学者不断询问和不断寻找自我身份。这种身份意识的关键就在于受制于西方话语权力秩序而产生西方中心的幻觉,其优越的感觉隐藏一种跨越的暴力和本土意义解读中深刻的文化危机。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在认真思考多元文化问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对后殖民状态中西方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凝视和歧视加以拒斥和批判,并对其根本片面性进行认真审理和批判。不妨说,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正常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这个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一种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一切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欲望和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使我们在新理性指导下,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文化形象。在反后殖民话语的同时,过分鼓动民族主义和东西方差异性,却有可能使宽容精神和远景胸怀消失在紧张对峙或者消费性大众文化中。甚至张扬民族差异而差异却不复存在,张扬民族精神而消费策略却使民族精神隐没不彰。如何避免这种反西化、反现代化导致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如何在多元历史和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式下,使“第三世界”的文化不成为一种“后历史”,并在保持自我相对的差异性的同时,而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标准的认同,确实是非常值得冷静深思的事情。

民族主义是后殖民时代的热门话题。民族主义在张扬民族的正义和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它不仅可以在有效的范围内团结民族的知识精英和民众,对西方的文化政治凝视和种族阶级歧视做出反弹性批判,而且可以对自身的文化策略和话语机制进行有效的改写,对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定位。但是,如果一味张扬民族主义而对抗世界主义,则有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即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对自身文化形象加以夸张性申述,从而重新走向冷战意识,走向自身的封闭和精神的盲目扩张。因此,对其正负面效应做出公正的评价,是当代真正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知

识分子,都只能从中国的当代实际出发,面对中国开放的新世纪图景,进行切实地有效的文化分析,从而确立自身的话语身份立场。

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知识分子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主义”,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狂妄,有着不可缺乏的纠偏功能。尤其在全球消费主义成为中心的时代,更需要弄清传媒文化消费的基本特征。

三 传媒文化消费的基本特征与价值剖析

一、单一线性传播与立体网络传播的差异性

后传播时代或“无纸工业文明”时代。这个全球化时代,纸质媒体将逐渐消失,人们阅读将通过网络进行。今天,很多电子阅读器只要插进小硬盘或者一个软件,在手掌大的一本阅读器上就可以设定阅读界面、阅读色彩、阅读方式、字体大小,里面储存的书相当于整整一书架。这种后传播时代的资讯保存和提取方式,使阅读变得随意方便,可以使思想网络般地传播,并可以轻易传播到海外。但是,这种网络阅读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作家写作的未终结性。人们写一篇文章,可以随时随地的根据不同的心境添加,文章成为永远都不可能完成的一个文本。同时网络上储存的文本,可以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空间加以理解,并可以不断地提出反问、批评、修正。因此,批判也变成了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过程。

由于BBS的帖子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发声,所以文本的“经”的地位、文本“阐释”的知识精英地位和权威性正在消失。

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任何解释加以怀疑,没有任何解释是终极的,每一种解释都要接受其他解释的挑战,使得意义变成一种散漫性的,而终难归于惟一的“吾道一言以蔽之”的所谓终极结论。

传播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几百万、上千万的文字,这其中除了有部分精品外,相当多的是情绪化的、语病迭出的、胡写乱涂的文化垃圾。文化垃圾的泛滥使得今天产生优秀的思想,或者使优秀思想文本浮出这类文化垃圾的水面变得非常艰难。这表明,后传播时代是文化垃圾和精英思想并存,它在消解了“经典”地位的同时已经宣布:一切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一切都要化进人类阅读的心灵当中,由一个人的思想变成千万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才会不断地传播并且存在下去。

“人类文化”其实是文明发展中不断升华生成的“文化人类”,只有跨入人类的生活、生命、精神中的文化深层,文字和文化才会不断地传承和再体验下去。科学的历程为人类产生、保存、收藏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反过来人类对这些文化的传播保存又推进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愿它们良性互动,而使明天的文化和精神变得更加灿烂和清洁。

二、主体的泛化与虚拟化

作为现代性艺术家的主体已不再是主体中心,“主体消失”、“作者死亡”(罗兰·巴特)的说法在解构主义者那里成为后现代习以为常的景观。如今,一些小说创作包括财经小说,大都是抄袭或者捉刀——出钱建一个“小说生产工厂”,聚集诸多枪手。一些跨国的电视电影制作也是这样,主体被泛化或者虚拟化,艺术家变成一种雇用艺术家或匿名艺术家。主体的淡化与过去的追求完美,像《红楼梦》中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那种“增删五次”、充满十年血和泪的写作已经不再存在。电视操作的流程成为这样:某个意向确立了本子路数,要求在70天之内出片子,于是就像工厂一样地加急生产。这与过去那种精雕细磨,“十年铸剑”,“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艺术创作完全不同。当后现代传媒时期一天铸一“虚拟之剑”时,大抵只能将主体精神和形象虚拟化。这种虚拟化表明主体不再具有超越性,它变得世俗化而重视肉身存在,这在影视逗乐中是每每使人感伤的事情。作